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0年 第2期 总207号

明六社成立情况细考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边明江

[摘　要]　关于明六社成立前后的史实已经基本厘清，但是仍有若干问题需要细致考察。为了更加精确地追溯明六社成立之初的相关情况，本文尝试在重新细致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指出：西村茂树关于明六社成立过程的经典叙述中有若干处疏漏甚至错误；关于明六社成立初期的核心成员，在西村茂树所列名单之外尚有数人，亦不可忽视；作为学术团体的明六社在组织上具有重视财务的特点，此外，明六社自成立之初起就表现出某种私密性，而这与明六社旨在“启蒙”民众的思想目标相左，这种矛盾或许是导致明六社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明六社　西村茂树　启蒙

引　言

明六社是成立于日本明治初期的学术团体，其中的诸多社员同时也是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其机关杂志《明六杂志》曾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明六社成立过程的考察，迄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大久保利谦的《明六社考》(1976)，后又修订为《新修明六社考》，收入《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第6卷《明治的思想与文化》(1988)，以及户泽行夫《明六社的人们》(1991)，这两部著作可谓精细而全面，已经将明六社成立前后的史实基本厘清。

此外值得注意的相关研究著述还包括：植手通有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1974)一书中分析了明六社核心成员的“社会学特征”；岩波文库本《明六杂志》上册(1998)所附中野目彻的解说《明六社与〈明六杂志〉》介绍了《明六杂志》的版本情况以及杂志发行当时评论界(读者)的一些反响等；河野有理《〈明六杂志〉的政治思想——阪谷素与“道理”的挑战》(2011)强调了明六社思想的内在多元性等等。《明六杂志》英译本《明六杂志：日本启蒙杂志》(*Meiroku Zasshi: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的译者 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在前言中简要介绍了明六社的成立背景与过程，以及明六社主要成员的经历与著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欧美学界的研究代表。在中国学界，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1989)与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2010)等阐述中也都曾细致地介绍明六社的成立过程以及相关问题。

关于明六社的成立经纬，经过以上诸位研究者的考证与论述，似乎已经无需赘言，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定论”或“常识”，但据笔者管见，在相关研究中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重新考察或者继续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明六社创立之初的原始史料有限，其中西村茂树《往事录》中的回忆尤为重要，也常被引用，引用者往往将其视为确凿无疑的史实，不加考辨地予以转述，但是西村茂树的回忆中有多处值得商榷的细节；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明六社初创期的核心成员，中外学者似乎未尝加以详细考辨，所以究竟哪几位成员在明六社成立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社员在明六社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关于这些问题不免语焉

不详；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明六社的特征，学界大多强调其“启蒙”的性质与作用，但是据笔者考察，明六社在成立之初虽然明确标举启蒙“愚民”，但是就其实际状况而言却似乎与此思想目标有所出入，但是此前的研究中似乎较少谈及此点。

1 对西村茂树回忆的考辨

西村茂树在《往事录》（1905）中颇为简要地回顾了明六社成立、发展与终结的过程。

> 明治六年春，萨人森有礼氏（代理美国公使）自美国而归，通过横山孙一郎，求与余面会。其时森氏寓所在木挽町六丁目高岛德右卫门家中。森氏曰，美国学者各从其所学，兴起学社以互相研究学术，且为讲谈以益于世人，本邦学者率皆孤立，互不往来，故而有益于世者甚少。余亦期望本邦学者如彼国学者一般，互相结成学社，集会讲究，且本邦近年来国民道德衰颓，不知伊于胡底，唯有老学士可救济之，故而今结一社，一谋学问之高进，一欲立道德之模范。余赞其事可也。因而两人相议，约定谋于都下名家，即福泽谕吉氏、中村正直氏、加藤弘之氏、津田真道氏、西周氏、箕作秋坪氏，诸氏皆表同意。依此初次相会，谈话讨论，后又决定公众亦可旁听政事学术之谈话，每月一回在精养轩（西餐店）楼上召开演说会，是为本邦演说之始。此会名曰明六社，因创设于明治六年故也。此前本邦学者，其知识皆限于和汉二学，无人知西洋事，明六社所讲则多为西洋新说，因此官员、学者等来听者甚多。寻机发行杂志，即《明六杂志》，是为本邦杂志之始。此杂志发行至第四十二号，政府发布新闻条例、诽谤律，抑制杂志等论说甚严，因此社员相议，停止杂志之发行。其后明六社社员亦有所增加，持续七八年，及于学士会院创立，则自然消散。[1]（笔者译）

文中的“萨人森有礼”指的是森有礼的萨摩藩士身份。这段话时常为学者所引用，但是似乎较少学者就其细节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大久保利谦意识到了西村茂树在这一段叙述中掺杂了个人的思想痕迹。而据笔者考察，这段话中至少有以下五点需要补充或纠正。

一，关于明六社成立之初的动机与宗旨，西村自述说“且本邦近年来国民道德衰颓，不知伊于胡底，唯有老学士可救济之，故而今结一社，一谋学问之高进，一欲立道德之模范”。关于“学问之高进”当无疑义，但是西村所谓感叹于近年来“国民道德衰颓”而“欲立道德之模范”，明显与明六社创立之初的基本宗旨有所偏差，大久保氏在《新修明六社考》中已经指出过这一点[2]。西村本人确实颇为看重“道德”，而且明六社中的中村正直等其他成员也确乎是重视“道德”的，但就明六社的整体思想主旨而言，“欲立道德之模范”层面的旨意无疑是次要的，不足以与“谋学问之高进”这一目标并列。

二，按照西村的表述，西村与森有礼是明六社最初的发起人，但有趣的是，西村提及的几位“都下名家”无一例外都是旧开成所（“蕃书调所”）出身的学者，而恰恰是这两位“发起人”身处这一旧时代最权威的学术团体之外。换言之，明六社是由两个“外人”发起的，基本上整体吸收了旧学术团体成员的新组织。而“诸氏皆表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许也正在于这些成员之间的私人（学术）关系比较亲密。例如文久元年（1861）幕府遣使前往英国，福泽与箕作秋坪作为翻译都参加其中，而在此之前，二人都曾随绪方洪庵学习“兰学”。西村茂树在“佩里来航”之后曾向手塚律蔵学习英学，获得英文文典一册后，他与西周一起研读。据说明治元年，新政府中曾有一位大臣尝试邀请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福泽谕吉到新政府中任职，但是福泽并未答应，这位大臣因此十分愤怒，甚至谋划禁锢福泽，此时森有礼站出来表示反对，福泽因此逃过一劫[3]……也就是说，在明六社成立之前，旧开成所出身的学者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这自然无需赘言，而西村与森有礼虽然在名义上是“外人”，但是他们与旧开成所相关的学者的往来也颇为密切。

三，明六社的演说会并不是一直都向公众开放的。《邮便报知新闻》第581号（明治8年2月6日）刊登了一则广告，表示明六社演说自当月16

日起，每月1日、16日下午1时举行，限定发行30张“门票”。不过仅仅两个月左右之后，明六社就宣布不再发行旁听票，希望旁听演说者可以向明六社的定员（参见本文下一部分）求助，获得允许后才可以旁听。在明六社成立之初，森有礼甚至一度反对用日语演说，主要是由于福泽谕吉的大力提倡，演说这一形式才首先在明六社内部获得认可。此外，明六社的演说会也并非“本邦演说之始”，最早的应该是福泽主持的三田演说会。福泽在明治8年5月1日的三田集会所发会祝词中表示，“我国开辟以来，开启集会演说之端者，以去年夏天我社中之发意为始……”[4]，也就是说三田演说会是先于明六社演说会的，而福泽早就意识到了演说这一形式的重要性，他不仅在庆应义塾内部进行构想并实践，而且将其带入了明六社的活动之中。至于明六社演说会的听讲人数，大致每次可能在五六十人左右[5]。此外，演说会所在地精养轩，是当时东京负有盛名的西洋料理店之一，地处东京湾的筑地附近，当时的筑地是外国人居留地，也就是说，明六社的活动地点也具有深厚的西洋背景。

四，西村所谓明六社创立之前“无人知西洋事”显然是谬论，《明六杂志》为“本邦杂志之始”也明显有误。中日古代冠以“杂志”之名的著述，例如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与江户时代皆川淇园《云萍杂志》，基本上都属于札记或笔记类，至于与欧美近代magazine相对应的“杂志”，在中国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麦嘉湖（John Macgowan）的《中外杂志》（1862年创刊），在日本则是柳河春三创办的《西洋杂志》[6]。当然，在《西洋杂志》刊行之前，西洋的一些杂志曾经零散地传入日本，比如在佐久间象山的遗物中就有一些荷兰文的杂志，蕃书调所出版的《官板玉石志林》则是从荷兰文的杂志中摘录翻译而成[7]。《西洋杂志》自庆应3年（1867）刊行至明治2年（1869），共6号，主编者为柳河春三，执笔者包括加藤弘之与神田孝平等。所以，如果说《明六杂志》是日本近代第一份学术性或思想性杂志或许更为准确一些。其实在明六社之前，通晓西洋学问的日本学者不可谓少，西村自己在幕末时代就曾师从佐久间象山等西洋学名家，那么西村为何明知而故误呢？或许这是西村为了突出明六社的“首创”意义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法吧。

五，在决定停刊之后，《明六杂志》实际上又发行了一期，所以总共有43期，而非42期。此外，《明六杂志》的终刊并不意味着明六社活动的终结，社员反而有所增加。至于“学士会院创立”，当指明治12年（1879）东京学士会院的成立。总之，明六社在废刊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再加上东京学士会院的初代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明六社旧成员，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明六社的延续，所以明六社的学术力量至少一直延续到明治10年代甚至更晚。

2 明六社创立之初成员细考

关于明六社创立之初的核心成员有哪几位，西村茂树、森有礼以及当时报纸上的说法其实有所出入，但是此前似乎并没有研究者专门讨论过。所以笔者综合几份材料，尝试加以考辨，以求厘清明六社成立当时在人员上的一些具体情况。

2.1 森有礼的信件

森有礼在明治6年10月19日致鲛岛尚信的信件中自述说，回到日本之后他筹划成立两个学术社团，一个是“书籍院会社”，一个是“学术文社中”，前者应指小型图书馆之类，而“学术文社中”即明六社。所谓“社中”，即society的译词。除此之外，森有礼还列出了当时参与者的名字，这封信是目前已知的提及明六社创立之初核心成员名字的最早的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当时有中村敬宇、福泽谕吉、津田真道、加藤弘之、西周、箕作、西村茂树、杉亨二、福羽美静、杉浦弘（未定）等九、十名，既已集会五回，皆悦喜研究，每月朔日与十六日两度集会”。[8]

这与西村的回忆有所出入，比西村的回忆多出了杉亨二、福羽、杉浦弘三人。此外，信中只是提到“箕作”，而森有礼自述一共“九、十名”，这摇摆不定的一人如果是指当时“未定”的杉浦弘的话，则“箕作”当指一人而非两人，但究竟是指箕作秋坪还是箕作麟祥则无法确定，指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2.2 《邮便报知新闻》上的两则信息

《邮便报知新闻》第289号（明治7年3月13日）的“告知栏”刊出《明六杂志》的广告：

> 《明六杂志》，每月两次出版。此为森有礼、福泽谕吉、箕作秋坪、箕作麟祥、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周、西村茂树、中村敬助、杉享二、畠山义成、清水卯三郎等诸先生结社，论事理，谈异闻，为促进我国之教育而会同商议，其谈论笔记者。故而刊布此册子，其开拓智识之补益尤大，请有志诸君翻阅。[9] （笔者译）

其中“中村敬助”与“杉享二”应当分别是“中村敬宇”与“杉亨二”。相对于森有礼的信件，箕作麟祥与畠山义成（即杉浦弘）的位置得到了确认和巩固，但又新增了清水卯三郎。

《邮便报知新闻》第531号（明治7年12月10日）“府下杂报”栏列出一份参加明六社集会的人员名单，编者先是表示“明六社之集会，因当今有名诸君子而益盛，议论愈发雄大，人员亦有所增加，故录其名于左”。然后罗列了当时的明六社成员：“定员”15人，即森有礼、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福泽谕吉、杉亨二、西村茂树、畠山义成、杉田玄端、清水卯三郎、中村正直、阪谷素、箕作秋坪、箕作麟祥以及后加入的津田仙；“通信员”5人，即美国人Williams Elliot Griffis、神田孝平、高木三郎、富田铁之助，以及即将加入的柏原学而（孝章）；“格外员”包括田中不二麿、九鬼隆一、古川正雄、秋山恒太郎、长与专斋等5名新入者以及前岛密、子安峻与柴田昌吉3名即将加入者；此外，由清水卯三郎任会计，世良太一任书记（秘书）。

相较半年多之前的《明六杂志》广告，所涉人员明显增多（当然杂志的广告只是提及代表者，并非全员），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杉亨二、畠山义成、箕作麟祥与清水卯三郎厕身“定员”之列，地位应该比较稳固；定员中的杉田玄端、阪谷素与津田仙在此前从未出现过，但是三人位列“定员”，说明三人在当时也具备相当的影响力；“通信员”与“格外员”的编制都是此前明治7年2月制定的《明六社制规》中明确规定的社员种类。“通信员”指“于远隔之地而心系文化者，经社员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者可选为通信员”；“自远国上京而短暂停留者”在经过审核之后具备“格外员”资格，所谓“远国”指远离东京的地方，并非外国之意。这两类社员固然也是明六社的重要成员，但是“通信员”不在东京，“格外员”的流动性又很大，人员组成并不稳定，所以“定员”（“定员”指“经常会同议事者”）无疑是明六社的核心，不过此处的十五名“定员”或许并未全部参与明六社最初的创建工作。

2.3 森有礼的报告

森有礼在《关于明六社第一年役员改选之演说》（《明六杂志》第30号）中如此回顾：

> 明治六年七月，余自亚米利加归来，谋划立社会同之事。诸君皆嘉其意，即速响应之，经三四回会谈，设立社则之议兴起。然而其议迁延至七年二月始定。……立社之本员总数十名，即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礼。其中箕作麟祥君后因病退社，失此博览之名家，实可谓本社之不幸，然诸君与余皆共同祈望箕作君再次来会。立社之后加入者五名，选为通信员者五名，格外员十名，共三十名。另有目为客员者，即获得本社之许可而临时来会者，其数不定。然以近时每会人数均有增加之势，不出数月，或可至于几百名。[10] （笔者译）

按照森有礼的说法，算上因病退社的箕作麟祥，明六社的初创者共有10人，相较于《邮便报知新闻》第531号所列“定员”名单，畠山义成、杉田玄端、清水卯三郎、阪谷素与津田仙5人没有被提及。森有礼这里提到的“立社之后加入者五名”，或许正是指这5个人；5名“通信员”，应当就是《邮便报知新闻》第531号所列5人；但森有礼所说的“格外员十名”具体指哪些人，除去上文明确标明的田中不二麿、九鬼隆一、古川正雄、秋山恒太郎、长与专斋、前岛密、子安峻与柴田昌吉8人之外，剩下的两人究竟何人暂时无法确定。

2.4　明治8年版《明六社制规》

明治7年版《明六社制规》在制定之后，经过较大增改，修订成为8年版《制规》。两版《制规》都规定社员分为四种，“定员”、“通信员”、“名誉员”与“格外员”，但是明治7年版《制规》并未附录当时的社员名单，而8年版则收录了“定员”与“通信员”名单。

根据8年版《制规》，“定员”包括：畠山义成、**西周**、**西村**、大槻文彦、加藤、田中不二麿、**津田真道**、津田仙、辻新次、中村、九鬼隆一、**福泽**、古川正雄、秋山恒太郎、浅井晴文、阪谷素、**箕作秋坪**、清水卯三郎（会计）、肥田昭作、**森有礼**、世良太一（书记）、杉亨二。

8年版的“定员”人数相较《邮便报知新闻》第531号的15名有了大幅增加，这说明在两版《制规》制定期间，应该有一次或多次“定员”的“扩大会议”，即将田中不二麿、九鬼隆一等部分原来的“格外员”以及大槻文彦等新加入的学者拔擢为“定员”，而为了凸显学社创始者的身份，又另设“会干”（笔者加黑标出）。不过，加藤与中村这两位资深社员却不知为何不在“会干”之列。同时，明治8年版《制规》出版当时，身份属于“格外员”的人数应该较多，而且流动性较大，以至于无法在《制规》上全部罗列。

2.5　核心社员表

由于以上不同材料中提及的明六社成立之初的社员名单有所差异，所以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其中的细微不同，笔者制作参照表如表1所示。

其中《报知新闻》明治7年12月10日仅列“定员”名字，《明治八年制规》仅列“会干”名字。

综上所述，福泽、中村、加藤、津田真道、西周、箕作秋坪、西村、森有礼8人的身份是毫无疑议的；而箕作麟祥、杉亨二与畠山义成3人应当也接近于学社核心，但是畠山义成在此后明六社的活动中几乎很少出现；清水卯三郎既是会计又是“定员”，而且他拥有的“瑞穗屋”不仅经营国外书籍的进口业务，还曾出版一些明六社员的著作，例如津田真道《如是我观》，所以其在明六社内的地位也不容忽视；此外，阪谷素与津田仙是明治八年时的“定员”，而神田孝平虽然是“通信员”，但他与阪谷素和津田仙都曾在《明六杂志》上发表论文，所以也应该是明六社的重要成员。

3　明六社的组织与思想特质

明六社的成立经纬大致如下：明治6年

表1　明六社核心成员表

森有礼信件 明治6年10月	《报知新闻》 明治7年3月13日	《报知新闻》 明治7年12月10日	森有礼报告 明治8年2月	明治8年制规 明治8年5月	西村茂树回忆 明治38年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
津田真道	津田真道	津田真道	津田真道	津田真道	津田真道
西周	西周	西周	西周	西周	西周
箕作（秋坪）	箕作秋坪	箕作秋坪	箕作秋坪	箕作秋坪	箕作秋坪
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	西村茂树
森有礼	森有礼	森有礼	森有礼	森有礼	森有礼
	箕作麟祥	箕作麟祥	箕作麟祥		
杉浦弘	畠山义成	畠山义成			
杉亨二	杉亨二	杉亨二	杉亨二		
福羽美静					
		杉田玄端			
	清水卯三郎	清水卯三郎			
		阪谷素			
		津田仙			

注：作者根据本文第一、二部分各引文制作。

(1873),森有礼从美国回到日本,根据他游历欧美诸国后的认识与感悟,他尝试在东京组织成立一个以自由讨论学术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为此他与西村茂树等人进行了多次的商议,最终将当时最知名也最有影响的学者几乎全部吸收进了这一组织,以定期集会的方式进行交流,因为创立于明治六年,故而称为"明六社",随后又刊行了机关杂志《明六杂志》,并举办公开演说会,后来由于政府言论管控的强化等原因,最终停止了《明六杂志》的发行,作为学术团体的明六社也随之解体,不过明六社的定期集会得以延续,而且明六社的大部分社员后来又成为东京学士会院等新兴起的学术机构中的重要成员。

明六社的成立与解散过程已经较为清楚,接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明六社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特征及其在思想上的特质。

其实,学者或文人结社自古有之,即便在江户时代也曾出现"蛮社"与蕃书调所等洋学者结成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应该也不是明治以后第一个学术社团,但明六社无疑是当时最具影响力也最为特别的一个学术社团。山室信一曾指出,相对于此前以西洋学术为主的"蛮社"等学术团体,明六社的特质体现在以下4点:不再以官位或年龄定级而是基本平等地交流;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学术圈内部而更具公开性;明六社具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定期举行集会;最后,明六社充分认知到社员们具备自由结社的权利,并通过自发地结成学术社团予以实践(山室信一、中野目彻,2009:455-457)。除此之外,笔者补充两点。

其一,森有礼虽然是明六社的发起人之一,但是森有礼出身倒幕派中坚力量的萨摩藩,而中村正直与西周等则是旧幕府的拥护者,所以明六社的一些社员在政治立场上其实是隐隐有所冲突的,但是他们却能够暂且抛弃政治上的分歧而合为一社,或者说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并未特别影响学术上的讨论,这体现出他们对于这一学术团体有着共同的期待,以及明六社建社精神中兼容并包的一面。

其二,明六社十分重视学社的财务,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学社的重要一点。明六社的财务是由专人负责的(主要是会计清水卯三郎),财务审计是委托杉亨二与津田仙两人负责的,而杉亨二本人正是明治时代引入西方统计学的重要人物。换言之,明六社的财务与审计工作不仅仅是金钱问题,同时也是新学问的具体实践。森有礼在他的报告中长篇累牍地谈论明六社的收益,以及据此收益可以获得更大利润的计划(包括建设会馆之后,将其出租以赚取租金费等),一般的学术社团当然也会涉及财务问题,但是像明六社这样公开谈论经济上的盈亏,甚至毫不扭捏地建议赚钱之道,算计利息,这在当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之前,学术团体大多讲求思想与文学上的交流切磋,重在追求一种和谐的氛围,至于是否盈利并非考虑的重点。此外,《明六杂志》的发行销售策略基本是"前金制",即预付制,根据杂志所附"禀白"(自创刊号起每期均有)可知,东京都内希望获得杂志的读者可以将自己的住所与姓名寄到报社,每期杂志发兑后邮寄至读者家中,至于偏远地区的读者,除了预付金之外还需另外提前支付邮递费用,否则不予邮寄。这些预付的资金有力地保证了明六社在经济上的稳定性,是明六社能够持续地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基础。在明治8年解散之后,明六社成员之间的集会甚至得以维持至明治40年代,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明六社积攒的资金尚未耗尽。总之,这些都体现出明六社重视商业效益与财务公开(学社内部)的新特点。而这种特质主要源于明六社作为近代性学术团体的某种独立性,因为在幕府甚至明治时期,包括翻译在内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很多是依靠藩主或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才能够实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即中村正直《西国立志编》初版之时,曾得静冈的旧德川幕府将军,以及首相大久保利通的资金支持),而作为独立团体的明六社并不像此前的蕃书调所一样隶属于政府,所以自然不可能获得"公费"的支持,所以就必须"自负盈亏",严格而合理地管控学社的财务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思想特质方面,明六社及其社员的自我定位基本上都在于"启蒙"民众。例如《明六杂志》创

刊号扉页上刊有一段文字，可视为《明六杂志》的发刊词：

> 近日吾侪盍簪，或论事理或谈异闻，一以研磨学业，一以爽快精神，及其谈论之笔记积而成册，镂行之以颁于同好之士。虽琐琐小册，然若成邦人开智识之一助则幸甚。[11]
>
> 明治甲戌二月 明六同社识（笔者译）

这一段“告示”在之后的每一期杂志中都有刊载，可以视作明六社对于《明六杂志》性质与定位的权威描述，即明六社社员们旨在通过“论事理”与“谈异闻”达到“研磨学业”以及“爽快精神”的目标，并希望以此帮助日本国民“开智识”。

此外，明六社社员们也曾表示他们的目标在于“启蒙”民众。例如在《明六杂志》创刊号的两篇文章中，西周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中表示，“若此社设立，入社之人无论为汉学者流、国学者流或俗人，皆应为有志之人，学向洋风之徒。如此则可谓延揽英雄之心，将天下人材网罗于一社之中。若得其法，则科学、技艺、文学、道德无不大略一致，彼愚暗之顽军自此始陨灭无遗，奏文明之凯歌。岁月之预计：一年定大略之法则，两年传播于都府，三年一成，七年传布于天下，十年妇儿诵之，小学生以此为入门之学。”西村茂树也在《应因开化之度而发改文字之论》中希冀“诸先生以卓识高论使愚蒙自睡眠中觉醒，立天下之模范，不负识者之望。”二者的表述都颇为清晰直白地指出了明六社在思想上的重要特质正在于消灭“愚暗之顽军”或“愚蒙”，以使“愚民”觉醒，从而“奏文明之凯歌”。

明六社旨在“启蒙”的思想性质似乎无需多言，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上也几乎都将明六社视为明治初期或日本近代“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但是就明六社成立之初的一些具体论说以及实际情况而言，却似乎也存在着与“启蒙”民众之主旨有所差异甚至相悖之处。

《明六杂志》除了在社会一般读者之中流通之外，森有礼还曾将杂志作为礼物赠送给政府高官，例如副岛种臣曾经在一封致森有礼的信中表示自己已经受纳《明六社杂志》两册，而且“欣而熟读”。（森有礼，1998：265）此信虽然年份不详，但也足以证明森有礼确实曾经向副岛种臣赠送《明六杂志》。副岛在明治政府中长期担任重要职位（外务卿等），而森有礼主动向副岛赠送杂志，不论其动机与目的究竟为何，至少表明了明六社的“启蒙”对象绝不仅仅是“愚民”而已。

而更为重要的是，明六社的“启蒙”活动其实一直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也反映出明六社的“启蒙”或许也是一种自我的“狂欢”而非真正遍及全社会的教育。西周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明六杂志》第1号）中表示，“然结社之一大要诀在于先定选举一社本员之法，黾勉从事之，不主动劝诱人，以白面生徒为忌物，应以密为要。盖人之本性，无不具备好奇心。挑起其性之法在于，愈隐秘则社愈兴盛，如此则有志者集于社中。”也就是说，西周理想中的学术社团应该是以“隐秘”为主的，甚至排斥“白面生徒”等不成熟、不够格的学者，这说明明六社在初创之时就不是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更倾向于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去进行比较“专业”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明六社最初的定例会也是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社外的普通士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机会真正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一个自创立伊始就标榜启蒙民众的学术组织，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却仍然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虽然明治八年二月左右起，明六社开始公开销售演说会的旁听票，但是仅仅两个月左右之后旁听票便遭废止，而希望旁听的人必须经过会员的介绍才可以获得旁听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再次加紧了对听众人数与阶层的限制。户泽行夫就曾指出，相对于售卖旁听票时期，在需要介绍人才能旁听这一时期，听众的社会阶层反而更加受限。[12]

4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西村茂树关于明六社成立情况的回忆即便十分重要，但是他的叙述也并非无可指摘，其中存在着若干史实有误以及表述不够精确等问题，此前的研究者似乎较少留意此点，所以此后的研究者在引用此段文字时务须加以注

意。再者，在明六社成立之初的核心人物群体之中，除去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与西村茂树等常为人提及的几位之外，畠山义成与清水卯三郎等人也不可忽视，他们对于明六社的贡献也需要学界进行重新审视。最后，原本旨在“破摧愚军之先锋”的明六社，自成立之初起就一直存在着“闭门”讨论的倾向，这与“启蒙”民众的思想主旨可谓背道而驰。虽然通过发行杂志、举办演说会等方式向民众发声，但是明六社在成立之初的“封闭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或者说，明六社自成立之初就具有的某种“私密性”或“自我封闭性”与其旨在“启蒙”民众的思想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一直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明六社的成立与发展，而这或许也是明六社仅仅持续一年多即分崩离析的重要内因之一。学界长期以来将明六社视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团体，明六社及其社员，以及《明六杂志》，都与“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本文尝试指出，明六社的特质中或许也存在某些与“启蒙”相悖之处，对于明六社身上的“启蒙”的标签，我们应该重新加以思考。

注

[1] 西村茂樹.西村茂樹全集（4）[M].京都：思文閣出版，2006：456.
[2] 大久保利謙.明治の思想と文化[M].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152.
[3] 森有礼.新修森有礼全集（4）[M].東京：文泉堂書店，1999：192.
[4] 福沢諭吉.福沢諭吉全集（20）[M].東京：岩波書店，1971：135.
[5] 木村匡.森先生伝[M].東京：金港堂書籍，1899：74.
[6]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264.
[7] 西田長寿.明治時代の新聞と雑誌[M].東京：至文堂，1966：33-34.
[8] 森有礼.新修森有礼全集（3）[M].東京：文泉堂書店，1998：124.
[9] 郵便報知新聞.複刻版（3）[M].東京：柏書房，1989：124.
[10] 明六雑誌.下冊[M].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東京：岩波書店，2009：49-51.
[11] 明六雑誌.上冊[M].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99：25.
[12] 戸沢行夫.明六社の人々[M].東京：築地書館，1991：84.

参考文献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M].東京：岩波書店，1974.
河野有理.明六雑誌の政治思想[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Meiroku Zasshi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M]. trans by 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6.

作者简介：边明江（1988—） 男 汉族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E-mail：bianmingjiangyy@163.com

Re-exami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irokush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irokusha, or Meiji Six Society, are basically known.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To describe the details of the setting up of the Meirokusha more clearly, this paper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rds. The current description of how the Meirokusha was set up and dismissed by Nishimura Shigeki is not totally exact, and some mistakes remain. About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Meirokusha, there are more than those on the list given by Nishimura. As an intellectual society, the Meirokusha valued financial af-

fairs,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groups. And since the day Meirokusha was set up, the membe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rivacy,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goal to enlighten the common people set by Meirokusha, and this might b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Meirokusha was dismissed so soon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Keywords: Meirokusha; Nishimura Shigeki; enlightenment

Author's Information:
Bian Mingjiang (Male) Year of Birth: 1988
Lecturer at Nantong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bianmingjiangyy@163.com

学术用语对照

教育学领域

日　文	中　文	英　文
中間言語	中介语	interlanguage
中級学習者	中级学习者	intermediate learners
聴解	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長期記憶	长时记忆	long-term memory
直接法、ダイレクト・メソッド	直接法	direct method
手続的知識	程序性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
転移	迁移	transfer
天井効果	天花板效应	ceiling effect
データ分析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t 検定	*t* 检验	*t*-test
ティーム・ティーチング	协作教学，小队教学	team teaching
トピックシラバス	主题教学大纲	topic syllabus
動機付け	动机	motivation
独立変数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読解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内容中心の教授法	内容型教学法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ナチュラル・メソッド	自然教学法	natural method
ニーズ評価	需求评估	needs assessment
ニーズ分析	需求分析	needs analysis
日本語能力簡易試験（SPOT）	日语能力简易测试	Simple Performance-Oriented Test
日本語能力試験	日语能力测试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認知法	认知法	cognitive approach
波及効果	反拨效应	washback
発達理論	发展理论	developmental theory
半構造化インタビュー	半结构化访谈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反応時間	反应时	reaction time
バイリンガリズム	双语现象	bilingualism
パタン・プラクティス	句型练习	pattern practice
被験者	被试、受试	participant
被験者間デザイン	组间设计	between groups design
被験者内デザイン	组内设计	within groups design
頻度	使用频率	frequency

（待　续）

参考文献：（见2020年第1期第60页）

（资料整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费晓东）